

□ 值年园地

赏，请我写了很多幅字，上送到高层领导，下送其儿孙，还送其中国和外国朋友。在香港和上海的李锦记大厦，还有一米八高、八米长的“思利及人”四个大字，在墙上最显著的位置。正是，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现在，国家正在强大，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想到当年受日本的侵略和凌辱，今天国富民强，我特别高兴。相信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会愈来愈伟大，繁荣富强。

我至今仍喜欢写诗，作了一首《毕业七十周年感怀》，追忆往昔、叙说现在，相信明天会更好！

七十年来家国情，
江河笔迹已留成。
新疆冰雪雄心烈，
甘肃风云壮志宏。
踏缺贺兰黄水到，
攀登从化电能生。
退休回港诗书画，
返老还童是我征。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陈世梁（1964届机械）

我是1964届机械设备制造及工艺专业六年制本科毕业生，至今已经毕业60年了。退休以后常常回首大学的日日夜夜，翻看整理大学六年写下的40多万字的日记。很多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都仿佛还在眼前——谆谆教诲、激烈辩论、关怀互助、远道实习等。

2000年3月，我60周岁时从《解放日报》退休。2014年，我毕业50周年，实现了在大学时许下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诺言。我想把自己的一生回顾总结一下，于是从整理历年文稿开始，经过8年努力，2023年春节前终于完成了35万字的回忆录《我怎样当记者》。

我觉得在上海市委的党报党刊《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工作的19年，是我大学毕业60年来最出彩的19年。人们一定很奇怪，一个学工科的大学生，怎么改行当了记者？

1964年9月25日，我到上海机床厂报到，被分配在厂工艺科，这是和我专业对口的科室。当时国家规定，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先劳动一年。我们被安排在油漆车间劳动。10月16日，厂部为新进厂的80多位大中专毕业生举办欢迎会，厂部安排我代表新进厂的毕业生发言。会后调我到二车间劳动，还没有摸到车床，厂部就调我到厂“五反办公室”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经历了一些运动之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在两个厂陆续走访了近百个工人家庭，了解了上海人的生活状况，交了一些青年工人朋友，不但听懂了上海话，还能“洋泾浜”地说几句。

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很长的编者按，说毛主席指示教育革命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为落实毛主席指示，厂里创办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

工人大学。此前，我到军宣队办公室帮忙，这次我又被军宣队调到厂政宣组，从事“七二一”指示的学习宣传工作。

1978年10月，我被调到机电一局教育处，参加机电一局系统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整顿工作，组建上海机电一局职工大学总校，任命我担任总校教务长。在机电一局职工大学总校，从招生、考试、毕业、教学管理到课程设置，我们按大学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后来又做了一些其他工作，十多年里，尽管我一直听从党的安排在努力工作，但我根本没有接触过技术工作，已经不可能回到技术岗位了。彼时我已经快40岁了。

1979年10月，上海市广播局在全市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条件之一是40周岁以下，我还没过线。我觉得这个职业专业性很强，而且我在学校时也当过校广播台记者，听过中央电台记者的培训课，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我报名参加了。经过初试、面试、商调、领导谈话等过程，1981年4月，我当了记者。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传承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创刊于上海解放的1949年5月，是一份面向全社会的大报。《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初级党刊，创刊于1954年7月，由时任市长陈毅同志题写刊名，编辑部设在市委办公厅。“文革”中停刊，1980年10月重新出版。刊物性质仍然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初级党刊，但编辑部作为《解放日报》的一个部门，设在《解放日报》社内。我是“定向”招聘到《支部生活》编辑部的，因此，我拿《解放日报》的记者证，干《支部生活》的活。

编辑部领导告诉我，作为党刊，必须



1986年3月，陈世梁作为上海《支部生活》记者，采访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留影

重点抓好党的政策教育、形势教育、理论学习等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指示我主要从事理论学习方面的栏目设计、组稿、撰稿、发稿任务。

《支部生活》既然是党刊，就必须发出党的权威声音，忠实传达党中央、市委精神，为基层党建注入正能量。但这方面的稿子，一般的基层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支持，得到市委领导的支持。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调到《解放日报》后，就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母亲和哥哥，被和哥哥一起工作的同事知道了。这位同事高兴地说：“国栋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平时很熟，他调到上海任第一书记我还没有祝贺他，正好让你弟弟去找他。”她让我哥哥转交给我陈国栋同志和他的秘书在上海的电话，让我和他们联系，转达对他们的问候。

有了这个“令箭”，我顺利地与市委主要领导陈国栋、胡立教以及他们的秘书联系上了，当面请他们支持搞好《支部生活》的有关宣传。他们听说我是党刊记者，高兴地说：“你们是市委的党刊，贯彻中央、市委的有关精神是媒体的责任，

□ 值年园地

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支持。”

有了市委领导部门的支持，《支部生活》在迎接党的十二大的一段时间里，陆续发表了署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的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大大提高了《支部生活》在上海媒体中的地位。

编辑部领导责成我抓好党的十二大的宣传。在中央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我们从出版文件专辑开始，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分期刊出“党的十二大报告内容提要”“学习问答”“问题解答”“小词典”“小测验”等不同栏目，化繁为简，取其精要，突出宣传党的十二大《党章》，在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字数不多但分量很重，具有权威性和可读性，作为基层党组织生活的学习内容，受到读者欢迎，市委也非常满意。

此后，我在报社和编辑部领导的支持下，主持编辑的《支部生活》栏目和文章，有许多次创造了上海期刊的“第一”或“唯一”。其中包括：

——1983年，中央决定对全国青年工人进行政治轮训，市委宣传部要求《支部生活》配合。《支部生活》版面有限，不可能全部登出讲课内容，我建议除了在《支部生活》上开辟专门栏目外，每月一次的讲课内容单独出版一本《支部生活（学习版）》公开发行。领导同意了，《学习版》发行量达21万份。《支部生活》“名利双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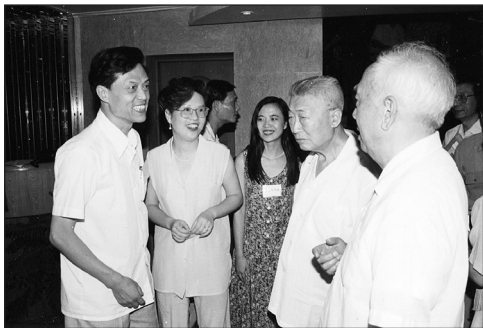
——1985年12月至1987年6月，为响应中央关于收集整理革命老前辈光辉事迹和丰富经验的指示。在中顾委办公厅、总

政宣传部、全国妇联、团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上海有声读物公司和《支部生活》合作，我们在北京采访了21位革命老前辈，以《革命前辈的心声》为总名称，出版了《将军的话》《致青年朋友》《母亲的心愿》共3集录音磁带，于1987年6月12日正式出版发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发行座谈会。首都各大新闻媒体都刊登了《革命前辈的心声》的出版消息。《人民日报》称：“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第一次”。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要求上海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陈至立同志指示宣传部要和《支部生活》配合，每年在《支部生活》出版一本反映上海建设成就的特刊。编辑部领导责成我负责主编。1992年是《上海·浦东·未来》，1993年是《跨世纪的历史丰碑》，1994年是《龙头昂首铸辉煌》，陈至立同志为每一期特刊都写了《序言》。我为能连续三年主编这一套专辑，展现上海发展的光辉业绩，感到无限荣光，终生难忘。

——根据报社党委的授意，1995年经过我的运作，创办了《党课教材》月刊；1998年8月，《党课教材》与中央党校求索音像出版社合作，创刊了音像杂志《干部视界》双月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专程来上海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并对上海市委、市政府支持办好音像杂志《干部视界》表示感谢，认为这是“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党员干部教育的有益尝试”，给予高度肯定。

——在刊物经常性报道上，为体现党刊和期刊的特点，我也出了不少好点子，受到读者好评。比如在宣传四项基



1994年7月6日，上海市委原第一书记陈国栋（右2）、第二书记胡立教（右1）应邀参加《支部生活》创刊40周年座谈会，左1为作者陈世梁

本原则、拨乱反正的各项任务时，针对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读者，我设计了甲、乙对话等形式，化繁为简，化深为浅，便于理解和接受。我也写一些短小精悍的理论文章，回答热点问题。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经济转型时期，大量原有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待业。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我设计了“政策解读”“问题解答”“咨询台”等栏目，刊登市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细则，方便读者对照执行。同时发表通讯、述评等宣传“送温暖工程”“再就业工程”，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

在朋友的邀请下，我也曾四次出国（境）采访。每次出访都有收获，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到阿联酋的访问，此行完全改变了我对中东的印象。回到上海以后，我立即动手写了《我驻阿联酋外贸人士建议：抓住时机开拓阿联酋市场》，被《人民日报》大内参转载，受到中央高度重视。随后几年，中央和上海与阿联酋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热络。

从《解放日报》退休以后，我继续为

社会做贡献。一是2001年协助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建党员服务中心，并在其中工作6年。二是2005年9月到2010年3月，协助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上海市社会服务局做一些文稿编写和宣传方面的工作。三是尽己所能为社区做好事。从2007年6月起，我应聘担任了5年的静安区政风行风监督员。四是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我担任《解放日报》退休党总支第四党支部书记，为本报退休党员服务。我在社区的活动是不拿报酬的，是一名志愿者。我的原则是要么不答应，答应了就要认认真真当份责任。这十多年的居民生活，我得到的奖状比我在退休前得到的多得多。

在发挥余热之余，我花很多时间回顾我在报社的工作情况。发现自1981年6月开始至2000年1月退休，我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近千篇自己写的稿子，约94万字。主编来稿200余万字，约占《支部生活》1981—2000年总用稿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主编专刊、专辑8种，18万字。此外，我还为《解放日报》承办的上海新闻业务培训班学员讲课。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自己没有违背大学毕业时许下的诺言，也做到了保尔·柯察金所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我在《退休感怀》中写道：当然，我的工作都是在领导的指示、支持和同志们的配合下完成的，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账下。我是“螺丝钉”，所以在“邀赏”时没有我。我从不主动申请任何荣誉称号，也放弃评定全国或上海好稿的机会。功过自在人心。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